

論知識傳統六：

城邦社會文字史論

歐崇敬著

傳統思潮社

論知識傳統六：

城邦社會文字史論

歐崇敬著

傳統思潮社

論知識傳統六

城邦社會文字史論

出版處：傳統思潮社

作者：歐崇敬

製版處：國華製版公司

代銷處：唐山出版社

電話：363-3072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 12 月

定價：新臺幣 2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著作一覽表

文學：《聖國系列叢書》

1. 《暗處裡·他們·牠們》(1986) 唐山出版社
2. 《來自聖國》(1987) 唐山出版社
(1993 三版 傳統思潮社)

哲學：

1. 《超越哲學論》(1988) 唐山出版社
2. 《超越形而上與自覺層次》(1990) 唐山出版社

歷史學：

1. 《文化本源中的知識傳統》(1993) 傳統思潮社
2. 《上古科學與民族知識傳統》(1993) 傳統思潮社
3. 《古代中國社會的認知承傳》(1993) 傳統思潮社
4. 《中國科學之認知基礎》(1993) 傳統思潮社
5. 《城邦社會文字史論》(1993) 傳統思潮社
6. 《中國社會史論》(待刊)

科學理論：

1. 《中國的科學理論及科學原理》(1993) 傳統思潮社
2. 《中國的科學原理和認知系統》(待刊)
3. 《中國文明的科學認知系統》(待刊)

《目錄》

- 《導論》：〈中國學術各科之方法論的重建〉 11
- 《第一卷》：〈商中葉到周代初期的文字與知識構造討論〉
29
- 《第二卷》：〈商文字資料出現前的幾種可能源頭和背景〉
39
- 《第三卷》：〈夏商二民族的知識承傳關係之討論〉 47
- 《第四卷》：〈夏民族知識發展歷程之可能性研究〉 53
- 《第五卷》：〈形成夏民族知識系統的背景〉 63
- 《第六卷》：〈夏民族之前的先行完成系統性歷程之各階段〉 67
- 《第七卷》：〈各分立城邦建立的基礎及起源因素〉 79

- 《第八卷》：〈城邦各階段的符號使用〉 87
- 《第九卷》：〈符號使用於新舊石器時代〉 93
- 《第十卷》：〈符號使用者的承傳性〉 99
- 《第十一卷》：〈符號與生命禮及萬有磁場的關係〉 105
- 《第十二卷》：〈從符號到文字的確立〉 111
- 《第十三卷》：〈文字代替圖、形、畫的使用〉 117
- 《第十四卷》：〈文字之原理性和認知性的確定指向〉 123
- 《第十五卷》：〈文字·圖形與文明〉 129
- 《第十六卷》：〈由農業興起到陶器文明間的文字符號〉
135
- 《第十七卷》：〈城邦會盟時代的完整性文字基礎構造〉
137

參考書目 141

作者著作目錄一覽表

導論：《中國學術各科之方法論的重建》

以往，學者所認定的人文、社會、藝術學科的分類已在西歐與北美、亞洲地區興盛了一世紀之久。在70年代以後的法國與美國、德國思想界終於看出這種學科分類上的缺點，而重新由後現代思潮及後結構主義思潮而打破學科上的分際，不再以學科為討論的最終預設，而以問題本身的所需條件進行討論；否則依尋著某單一學科而自行限定其討論基點，仍無異乎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製造，也就是一種屬於“專家的名利所為作為”而已。這種需求特別是在權力與意識型態加上知識充分結合之“大學講壇”和“國家學術機構”裡多所講求，而這些成果乃經常地只是一種“複製性的商品”，很難出現對文明推進有所貢獻的作品；當然，這其中仍不應全然否定，許多學者若能堅持其內在的理念，則依舊為許多文明、文化的基礎文獻性整理有所完成。

以此，學者對於這長達百餘年的西歐學術分科及各科之方法論的風起雲湧，亦應該有了“商品倦態”狀況出現了，一切的方法設立，不過是〈文字與句法〉對準其〈文化規模呈現的對象〉而表現的幾組概念而已，這也就由文字構築出一種特屬於某種研究意識型態上的“討論空間進行陣式”，只是這個陣式是一組組的概念系統相互連接而成者罷了。在此，很清楚可知，這些空間的先行性，也就是各學科的劃分所在，亦即各個人文、社會、藝術學科的設基之處，乃至成爲一種學科之意識型態處，而所謂的

“學術大師”即是由其西歐傳統的學科內之概念系統作出新的勘定和分類或組合，以成就一個新的學科時代性的思考意識型態；若讀者仔細思考即可知：〔人類學的馬凌諾斯基、弗萊哲、克魯伯、牟斯、懷特、本維尼斯特、泰勒等〕→〔心理學的佛洛伊德、容格、阿德勒、史金那、艾立克森、皮亞杰等〕→〔社會學的韋伯、孔德、涂爾幹、馬克思、哈伯瑪斯、派森思、基爾森等〕→〔歷史學的湯恩比、伯藍尼、史賓格勒、布勞岱、科林伍、布洛克等〕→〔哲學如康德、黑格爾、胡賽爾、海德格、維根斯坦等〕皆是。這些討論對於近一兩百年來的文化界確實吸引許多有志之士，也同時因其著作中的概念而製造了許多知識性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出觀看則可以知道是一種“問題的製造”而不是什麼〈問題的討論〉其書寫是一種〈為思考而組合的概念系統與問題和方法之提出〉，而不是為清晰地解決一問題或對一問題作最整合而徹底的呈現；如此，很清楚這些所謂的“學術大師”是如同資本主義興起與西歐中心主義而造成之過分誇大地位，就其著作而言，在西歐與北美的文化區中尚有“溝通與社會演化”的作用。對於亞洲和其他文明區則僅為一種思考上的展示是如同〈檔案〉一般地僅供參考而已。其所謂的方法論也是其語言文字所構成的一“方便之徑”，而就其自身而言仍是破綻百出的理論，是以方在二十世紀的七〇年代開始受到強烈的質疑。

這一點中國、日本與韓國三個國度的學術界自十九世紀末至今始終未能恢復民族自信心，而一味地學習西歐傳統構造的大學制度；以培養科技官僚和所謂的專業人材，因而致使對於自身文明的問題把握方式，不能回到自身之中，只是一味地轉移西歐所謂“大師”的理論，並將其“中文句法化”而運用其概念成爲中國學術界之“典範”。這一點在早期問題提出之倡導時代尚有其效用，一旦在問題提出之後，亞洲學者即應該回到自身的文明根源而思考應有的分科方式和自身所特有的方法論。然而十分可

惜，亞洲之各文化程度本即已高出西歐的國度與民族之學術社羣，但顯然卻十分崇尚“流行服飾”，並且“信仰西歐與北美的科技和專業以及大師”，中國、日本、韓國所謂的著名學者竟然大多是以熟悉某幾位西歐與北美大師之理論而為自身著作之骨架以自豪者，並受到社會的敬重，這種現象直到接近二十一世紀的90年代依舊如此。那麼，也就意味著中國、日本、韓國這全然不同的文明系統之繼承者是自行放棄內在的豐富性，也不需自行思考，只需思考其他民族與其他文明中的意識型態即可安心地在各大學講壇和研究機構稱霸一時，例如：只應說為文獻學之一部分的“康德哲學”、“胡賽爾哲學”、“韋們社會學”，等很奇特地在西歐中心主義和亞洲創造力的喪失之下，能熟悉這些文獻之概念系統者居然皆在中國、日本、韓國成為“學術大將”或“學術大師”。對於某一位歷史上的學者之文獻與所述概念有所掌握而可以在〈知識與權力的結構〉中稱為霸業，恐怕是人文化過份發展才有的狀態。對於上述的研究並無不可，然而僅是作為一種理解和研究即可；十分嚴重的狀況是當代中國居然出現以“康德”、“胡賽爾”、“柏格森”、“杜威”、“懷海德”、“海德格”、“韋伯”、“馬克思”、“叔本華”、“維根斯坦”等任何一者的理論和方法系統要求重建中國學術，這在下一個世紀的中國學者研究上實在應該先有效地理解，這一代中國人的心靈狀態何以受到如此的扭曲。在更早先的時代裡，學術界尚可見到以印度佛學為重建基礎的討論，年輕一代一旦進入學術界即以爲：討論中國文明之問題即必需如此，並且深信不疑，終於造成各種“西歐與北美學術大師”在中國學術領土上各有擁護者，而且各自自行成陣容，終於成為各種意識型態和各種學術陣容對立的狀態。

在這個時代裡：許多學者深信，中國思考必定要與“康德”產生一溝通才能重建，大多數學者更深信，沒有西歐的學術方法，中國學術不可能現代化，甚至說沒有西歐學術方法論即無中國的

當代學術成立可能。對於這種把民族自卑感與西歐北美中心主義應用在學術討論上的情況，直到目前依然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大多數的中國學者錯誤地把西歐北美的某種方法意識作一種研究上的堅持，很清楚地是以西歐北美為價值的優位，並認為持有此優位的研究意識型態即掌握了由中國學術社會中的〈知識與權力〉之高位所在。當然，由於大學體制如同於其他的科層體系，亦當僅是一種權力結構和知識系統上的互動關係。人在此中的所在狀態經常地提醒自身保持一地位，則十分正常，那麼彷彿文明創造力存在與否再也不太重要。大學體制內的學術思考，如同任何行業或者任何組織，只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組成，只不過其中只要的符號是“文字”，而不是“金融”、“貨幣”、“藝品”；“商品”、“武器”、“公文”等。那麼，要期望大學體制重新回溯於中國文明的基礎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在本世紀之初許多著名學者由西歐、北美、日本、蘇聯所學習而來，並提倡一學科性方法的研究動機尚是可以接受的，當時的學術狀態，其提倡確實能夠使大多數的從業者有一個問題把握的方向，但這樣的提倡並非對於此方法的信仰，是以在那一時代的學者往往能對中國文明的討論完成較有規模的建樹；然而，這樣的提倡卻同時也為日後，未能完成中國文明討論之屬於自身方法之際的狀態下之對西歐與北美大師學說的意識型態信仰。

在這裡，可能舉出：①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學運動〉，是漢語文如何延展的問題性內涵思考與提倡；但胡適由實用主義之杜威的方法論為其骨架在其學術思考加以應用則是一種迷信，這兩個層面應加以區分。②顧頡剛、錢玄同的〈古史辨運動〉，這種研究動力固然令人欣賞，但同時即為一種激進的意識型態之堅持，當然就顧頡剛本人對於國學與民俗的層彙研究法而言，確有其獨樹之處，然而就其史學研究的信念上，乃的確存在著由於西

歐方法論而造成的偏頗，這樣的研究或說是由一種概念性的空間延展在史學界經過了幾十年，而由其西歐其他學說理論而取代，就像流行風潮的改變一般。^③〈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這一大規模的論戰雙方幾乎都在問題點極不清楚的狀態裡進行著，包括兩著的指謂對象皆不清晰，論者在此充分地表達個人的熱情與信仰和意識型態立場，造成這種混亂的大辯論原由，主要是當時學者對於中國文明本身的特性及文字性沒有深刻地理論，並且對於西歐所謂的科學與玄學之內涵皆存在著“迷信”的態度，而又缺乏對西歐文化的文字性以及發展中的問題有一脈絡瞭解，只是急切地希望為中國學術快速且便捷地找出一個方向，在這一場爭論裡出現了數十位當時知名的學者參與其中，可見其時代的中國學術與學者對中國理解能力。^④〈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學研究方式〉：這種方式直到70年代仍十分重要，整個中國史學界幾乎受限於此研究的意識型態，雖然其研究方式使文獻學的討論有一規模、確使文獻的內涵之隱含可能受到抑制，而使史學成為陳腐的研究。^⑤蔡元培對於民族學、美學、教育學上的提倡，這可以說是一種國內風氣之先而不僅是一種信仰，如同於梁啟超、嚴復、王國維的一種對外國學說把握問題方式的引界。只是嚴復深陷在英國功利學派乃又為另一種意識型態之堅持。^⑥董作賓、李濟的考古學研究：這可以說是為中國文明的回溯作一個首度性的基礎重建之工作，直到現代，中國考古學者如張光直等尚保持著開放性的思考，對於中國文明的特質理解乃有其正面的貢獻，然而，其研究仍屬一基礎，並未能在其基礎上完成一屬於中國文明的討論方法論文字性的理論建構，亦及未完成屬於中國文明之漢文字的時空性概念組成，這是當代學者應努力的方向。^⑦費孝通、凌純聲、芮逸夫、林惠祥、衛惠林等學者在民族學、社會人類學上的調查性研究提倡：這些研究和問題的把握方式確實亦為中國學者把握社會空間中的問題作出一些基礎，問題在此這些學者的動機正確，但

在研究未理解的方法骨架確實在西歐與北美的人類學理論、社會學理論，如此對於其所討論的問題也就經常地陷入其背景之理論內部，這理狀況直到今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術裡尚未改變，並且更加嚴重，許多討論的對象成為西歐與北美理論的試金石而已，在學術討論上更只是各學派各理論交戰的場合而已。^⑧在文化思維上，熊十力主張以唯識論與周易之其新概念系統作為理論體系；梁漱溟以印度佛家為基礎作一融合或概念性的文化會通；馮友蘭以新實在論與宋明理學構造“新理學”；金岳霖以西方邏輯學，分析哲學；方東美以柏格森、懷海德、尼采；牟宗三更抬高康德為中西會通的重要依據，賀自昭以黑格爾為基礎等都無異於在製造一種新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國文明而言，只能說增添一種文學性的展示；^⑨在文學藝術上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等爭論；^⑩在更早先的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等討論；^⑪在史學上以馬克思史觀為一切依歸的創作如郭沫若、周谷城、侯外廬、范文瀾、翦伯贊等同於傅斯年的提倡一般是以另一種意識型態的堅持而研究中國文明；^⑫史學在70年代後更引進“韋伯的方法論”、“新史學”研究方法、“年鑑史學”研究方法、“功能學派”、“心理史學研究方法”等，這種方式與堅持以馬克思史觀為研究實在沒有什麼高下之別，堅持韋伯就比馬克思為高明嗎？是否為新的流行可以一新口味，以免學術著作過於單調呢？這些現象很明顯地是當代中國學術與日本、韓國學術皆最為熱衷的事情，不論在文學、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考古學、文化學、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只要一涉及學科各學術就必需有西歐學術的行情，即使是藝術如：音樂、舞蹈、雕刻、繪畫理論亦不例外。當代中國學者已形成一種“文人病”即：一言及西歐理論即為之信仰或迷惘或從屬的心態。而所謂的海外學人更經常地高居國內學人之上，學術界竟皆是〈價值、權力〉關係，其客觀性不如說是西歐與北美意識型態性的表現。

就在中國文明與亞洲文明中的各民族之學術承繼者經百年來的動盪而未能完成屬於自身文明與文字之方法論之際，其理論思考能力之狀態裡，西歐與北美的學術方式當然順理成章地入主中原和入主亞洲。事實上，中國、日本、韓國的學者也幾乎相信，研究方法必稱西歐北美或蘇聯，而不肯相信中國、日本、韓國自身的文明與文字性能出現什麼理論。在亞洲而言、中國、日本、韓國的學者也許並不關心其所承繼的文明內涵吧！而真正關心的是如何使其學術立場和展現方式如同西歐與北美學者的社會性之現代化與後現代化吧！所幸，中國學者雖受到西歐北美學術的侵略而遺忘自身的內在可能出現的方法性，但仍保持熱愛自身文化的關懷，民族學者：〈費孝通、芮逸夫、凌純聲〉；史學家：〈陳寅恪、呂思勉、錢穆、陳垣〉；思想家如：〈梁啟超、蔡元培、唐君毅、王國維〉等；美學家如：〈宗白華、朱光潛〉；考古學家如：〈董作賓、李濟、石璋如、于省吾〉；國學家如：〈屈萬里、徐復觀、馬一浮〉；古文學者如：〈唐蘭、李孝定、龍宇純〉等都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作出直接的貢獻而不致於所在理解的同時造成太多的意識型態之介入。這樣的研究者在當代中國學術百年左右的發展史中完成其最基礎性的貢獻，由於上述學者以一種純粹中國文明的心靈努力連接著中國文明的各時代性之間，並使得中國文明的研究者能夠保持一股真正的力量在這幾個世代裡，而成就著數以百位計、甚至千位以上的學者能不以西歐北美的方法為依論，而悄悄地在中國文明的心靈裡完成理解與認知上的連接，乃為中國學術與中國文明的討論在21世紀的新起點上有一個完全屬於中國文明與漢語文、漢字性的方法和理論之多元涵指，來為中國文明內在之間問題作一確實的討論。

當代學術可以看到人類學如：史作檉；歷史學如：杜正勝、龐樸；文字學如：李孝定、裘錫圭、高明；思想史如：湯一介、韋政通；考古學如：張光直、李學勤等都在60年代以後的中國學術